

浅谈泰戈尔对中国的影响

【摘要】

1913年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英文版的《吉檀迦利》1912年在伦敦出版，随即风靡了西方世界，共包含103首诗歌，这部诗集以优美的韵律表现出泰戈尔的宗教思想，庄严肃穆，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哈拉尔德·雅奈在授予泰戈尔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辞中，对《吉檀迦利》的评价是：“完美性”“文体韵律的均衡”，“选择字句方面的严谨性”。而这样的诗人也深深影响着中国，不仅是对中国的诗歌创作起到引导性的作用，更是对中国的政治思想变革起到了很深刻的影响意义。

【关键词】：“泰戈尔热”、泰戈尔 《吉檀迦利》

正文：

泰戈尔70高龄时学习作画，绘制的1500幅画，曾作为艺术珍品在世界许多有名的地方展出。泰戈尔写歌词1200余首，并为其中大多数歌词谱了曲。今天印度及孟加拉的国歌，均出自泰戈尔，一人为二国作词，前所未有。个人天赋和时代造就相结合使他成为印度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改革家，在印度文化诸多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给印度和世界留下了一笔异常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国最早介绍泰戈尔诗歌的是令人瞩目的新文学的晓将陈独秀，在《新青年》的第1卷第2号中，发表了他翻译的《吉檀迦利》中的四首诗歌，以英汉对照的方式登出。此后泰戈尔的作品陆续传入到中国，受到了一大批中国文人作家的推崇。

一、泰戈尔的文学作品的传播所引发的“泰戈尔热”

从1913年起，泰戈尔的思想和文学就在中国传播开来。徐志摩说到1923年“泰戈尔在中国，不仅已是普遍的知名，竟是受普遍的敬仰”。1924年，泰戈尔受孙中山邀请来华讲学，一时间，各大报纸、杂志纷纷刊登欢迎泰戈尔的专号，文学青年们竞相翻译、介绍泰戈尔的诗歌、小说、戏剧，还有一些团体排演了泰戈尔的剧本，泰戈尔在中国所做的20次公开讲演及数十次小型谈话被各大报刊纷纷转载，掀起了中国的“泰戈尔热”。

20年代，在泰戈尔汉译作品的背后，站着一个庞大的良莠不齐的翻译者的队伍，有专门的翻译家，有编辑，有文学家，有文学青年等等，因而各种翻译现象都有可能发生。当时，围绕泰戈尔的译文，中国打起的笔墨官司不计其数。

①文学作品的翻译以及翻译中的频繁论战。

重译：泰戈尔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在中国的翻译屡见不鲜，有很多都是同一作品的重译。在一些文学作品的翻译中，甚至发生了严重的“撞车”事件，可是翻译者毫不忌讳，各自进行着自己的翻译，并将其纷纷发表，因而出现了泰戈尔的小说、诗歌和戏剧的如火如荼的重译现象。

选译：郑振铎与梁启超对选译问题的探讨

误译：泰戈尔的诗歌多是从英文译过来的，但是翻译者马虎大意甚至英语水平太低而造成了误译；另一方面，翻译者分别归属不同派别也是引起翻译论争的主要原因。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不同（印度诗歌含有丰富的音乐元素）

中国文学的翻译史上似乎再没有一个外国作家受到这样的“礼遇”，中国文人围绕他的译著打起了无休止的“笔墨”官司，这些论争也说明了泰戈尔的文学作品在中国的翻译界、出版界以及读者界，曾引起过广泛的关注和兴趣。

②“五四”时期的思想论争：

报刊杂志上，有关泰戈尔的“唇枪舌战”你来我往，愈演愈烈，赞美派从审美的和伦理的角度来看泰戈尔，否定派从政治的和历史的观点来审视泰戈尔，最终上演了一场热闹的“泰戈尔风波”。

东西文化论争和救国话语方面的论争，其中泰戈尔来中国进行的演讲中很多都是在宣扬东方文化，他认为东方文明取代西方文明的时期到来了，他的观点引发了鲁迅、周作人等一大批学者对于中国如何救国图存以及中国文化问题的关注和焦虑。

③沟通了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

泰戈尔在中国的演讲中多次强调：“印度与中国的文化合作在数千年前已经开始，两个国家像兄弟一样友善，但“在这千年内，我们往来的道上也许满长了草……我们共同的事业就是去除我们胸膈间壅积着的杂欲，再来沟通这个名贵的情感的交流”。[1]

泰戈尔在中国的讲学引发了“泰戈尔风波”，因泰戈尔讲学与中国的社会环境不符使泰戈尔承受了很大的诋毁和批评。泰戈尔访问中国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了三年，国内正进行着国共合作，国民革命运动正在发展中，阶级斗争日益激烈，正因为如此，泰戈尔势必卷入政治论争中，加之当时思想界又趋于排外与复古，所以泰戈尔的魅力摇摆在中国社会中。

二、“五四”时期的文学主题的流变

泰戈尔文学主题基本倾向的三大方面：“爱”的福音，“梵”的现实，“我”的尊严，如何影响了现代文学中的情爱观、自然观和生命观。具体表现：

1 戈尔的“爱的哲学”影响下的中国文学的情爱观

泰戈尔主张以“爱的哲学”来自我完善，用非暴力思想来调和所有的矛盾，因而以其和谐的内在统一性，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泰戈尔在诗篇中着重探索人的“自我本性”，使人走入爱的理想国。而这自我的核心就是爱，“爱”是使人获得内在思想动力和外在行动生活的能力，是推动自我向前发展的动力。“五四”前后，对泰戈尔的“爱的哲学”多层含义的解读，使中国文学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A、出现了大量的歌咏童心、母爱、自然美的文学作品，直接引发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三种爱的模式：母爱、自然爱和童贞爱，但最终将文学导向和谐、理想化的境地。（放在“五四”运动以后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酝酿时期的具体环境中去考察。此时阶级斗争日趋深化和激化，使得部分知识青年既不满现实，又不敢与反动统治者作斗争，他们迫切要求取一种精神上的安慰。此时，泰戈尔柔美、温情的文学作品进入青年的心田里，成为解放人的精神、愉悦人的心情的一种精神安定剂。）其中冰心无疑是在最高程度上再现“三爱模式”的中国作家。

“五四”前后，她创作了大量的问题小说，但她温婉平和的性格无法面对现实尖锐的问题，最终只能针对当时青年的危机——“悬在天上人间的中段”，“不能升天，不甘入地”，开出了深沉的母爱，神妙的自然，纯真的童心的药方。在无论何种体裁的作品中，宣传爱已经是冰心不变的使命。

但是，用爱来调节一切的，爱成了化解一切矛盾的主要力量，使得小说正如一篇小说《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中：青年凌瑜原本不关心政治，在“五四”热潮的冲击下，他认识到在“国家兴亡”面前，“匹夫有责”，从此，他竭力奔走，全力以赴，不久全民族的救国热情冷淡下来，凌瑜也哀莫大于心死，正当他准备纵身入海时，突然听到了在沙滩上玩耍的两个小孩喊道：“先生，世界上有的是光明，有的是快乐，请你自己去找吧！不要走那一条黑暗悲惨的道路。”于是，凌瑜心中的沉郁散尽了，产生了一种庄严肃穆的情感，“我知道了，世界上充满了光和爱，等着青年自己去找，不要走那黑暗悲惨的道路！”然后他就不想死了。在矛盾应该进一步展开的地方，笔锋突然一转，让爱来解决小说中设置的矛盾，这成为冰心最常用的杀手锏，无往而不克。受了泰戈尔“爱的哲学”影响的王统照的小说《微笑》，认为爱是改变人生的伟大力量，一个年轻的小偷在牢房里无意中得到一个女犯人的微笑，这微笑被他理解为“广博

的爱人类一切的慈祥的微笑”，于是，这个年轻人被这微笑完全感化了，在他刑满出狱后变成了一个勤劳的工人，转变得极有戏剧性。可见这样的文学创作是很理想化的，因而也没有厚度和深度。

B、受泰戈尔艳情诗的影响，中国情诗开始专向理想主义的方向发展，以《园丁集》为例，中国作家进行了艳情诗的模仿，表达自己对理想爱情的追求。

泰戈尔的爱的理想主义，在徐志摩身上尤为明显。正如朱湘所说，“情诗正是徐君的本色当行。”徐志摩写下了很多情诗，有我们所熟知的《沙扬娜拉》，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沙扬娜拉！

沙扬娜拉，日语“再见”、“珍重”的音译。这组诗无论在情趣和文体上，都明显受泰翁田园小诗的影响，所短的是长者的睿智和彻悟，所长的是浪漫诗人的灵动和风流情怀。诗人在短短的五行诗句中，表达了对日本文化风物的赞美和神往，表现了对日本女郎依依惜别的深情。

C、受泰戈尔“闺怨诗”的影响，一些男性诗人拟想女性的天真烂漫，表现了对女性的极大的尊重，具有很强的隐喻性。这些男性写就的描写女性情态的诗歌文本，成为现代文学中独特的文学现象。[2]

中国此时正是恋爱大解放的年代，在诗歌中歌咏爱情成为一种时尚，一些男性诗人受“五四”时期倡导的对妇女问题关注的影响，写下了大量的“闺怨诗”。王统照的《紫藤花下》叙述了一个“微微的细锁眉痕”的女郎在闺情中的忧郁，即“我愿与你相见，”却“又不忍相见！”这样的一种含蓄的闺情，但却希望自己所爱的人能够接到自己的气自电”，少女在紫藤花下接着飘荡的花片，放在砚池里，并在花上写下了少女想与自己的情人相见，但又羞于与他见面的情感，于是只好把这“镌上心痕的花片，夹在他的诗集中，/任风吹虫蚀，香痕儿永久不散！”与《园丁集》的第8首、33首很相似。

2 戈尔的“梵的现实”影响下的中国文学的自然观

泰戈尔深受印度传统文化中的泛神论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梵的现实”使虚幻的梵转化为自然生命的现实存在。“梵的现实”暗合了中国古代的泛神论，古传的佛教观念和道家的虚无主义以及文学中的山林隐逸传统等，都沉淀为集体无意识，使他们能够接受泰戈尔的泛神论。[3]

郭沫若接受泰戈尔的泛神论，从泛神论中吸取了追求个性解放、反抗封建的力量，在《创造十年》中指出：“因为喜欢泰戈尔……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思想接近了，郭沫若是中国新诗第一人，他认为自己是中国最早接触泰戈尔作品的人；郭沫若对泰诗评价极高并刻意追求，他称自己文学生涯的“第一阶段是泰戈尔的”郑克鲁说郭沫若正式把爱国精神、个性精神和从泰戈尔那里接受的泛神论思想融于一炉，作为自我表现的动力，汇集成一股反抗现实，冲决封建桎梏的豪迈激情，写出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伟大的诗集——《女神》，为中国新诗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三、泰戈尔促进了中国“五四”时期文学体裁变革

泰戈尔的散文诗以它独特的魅力备受中国诗人的青睐，介绍者、模仿者不计其数。以冰心为例：

泰戈尔散文诗的情感特征（突出了情绪性和音乐性、沉思的唯美情调）丰富了中国散文诗的情感内涵，在某种意义上，促使了中国作家更自由的在散文诗中，表达自我情感，真情演绎人生体悟。

泰戈尔的散文诗形式多样，包括寓言体、民歌体、剧诗、小诗等，其中小诗是最自由、最短

小的散文诗体式,由于泰戈尔对中国的小诗影响比较大,在 20 世纪 20 年代,在中国掀起了小诗的运动。冰心是中国新文学女性作家第一人,她早期的创作受到泰戈尔的明显影响,冰心说:“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把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4]

由于对泰戈尔散文诗过分模仿,加上中国诗人自身的原因,也使中国散文诗创作上也发生了令人遗憾的后果—平庸、粗糙、柔弱,有些甚至不能称其为散文诗,更多地注重了散文的素质,而忽略了诗的性质,因而成为拉杂的毫无诗味的叙述。后来,闻一多等人起来倡导诗歌形体重建的运动,还有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的问世,将散文诗的内形式和外体例结合得更加完美,标志着中国的散文诗发展到一定的高度。

四、泰戈尔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风格发展

泰戈尔的优秀文学成果,为我国新文艺注入一股清新、自然、质朴的诗风,促进了我国新诗的发展。泰戈尔的文学作品影响了中国很大一批的作家的创作,尤其是五四时期,也影响了当时文学的风格。对当时正在萌芽的白话文、白话诗的中国新文学,起了临门一脚的作用,可以说泰戈尔间接成就了五四新文学运动。[5]

总结:

顺应西方泰戈尔诗歌的热潮,在中国最早为泰戈尔带来诗名的也是《吉檀迦利》,它是泰戈尔最重要的诗集。而以此为例来分析泰戈尔的作品在中国流行的原因其一,文章短小已翻译,为中国新产生的期刊杂志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他们把这当做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沟通的桥梁。其二,优秀翻译家的努力;郑振铎译的《飞鸟集》(1922 年商务版)和《新月集》(1923 年商务版)、王独清译的《新月集》(1923 年,泰东版)、郑振铎、赵景深等合译的《泰戈尔诗选》(1925 年,商务版)等书[6]。所以,泰戈尔对中国而言,彰显的是世界文化流动、自主融合的过程。正如周恩来总理 1956 年在印度国际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的大会上的演讲中所指出:“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参考文献】

- [1]:张羽:《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东北师范大学 2002 年出版,第 53 页;
- [2]:徐艳萍、谢娟:《谈泰戈尔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唐都学刊》,2009 年 3 月第 119 页;
- [3]何乃英:《泰戈尔传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92 页
- [4]:朱凤华《自然·哲学·爱——<飞鸟集>与<繁星>、<春水>的比较》,《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 年 3 月第 33 页;
- [5]陶德臻:《东方文学简史》,北京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86 页
- [6]S·C·圣笈多:《泰戈尔评传》,董红钧译,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20、125 页